血肉筑起的长城

——回顾抗战中的文学

宋　嵩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严峻的历史形势下，文学担负起唤醒民众、实现民族救亡的使命；文学界掀起了以颂扬英雄主义为基调、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创作浪潮，向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输送着民族的精气，自觉地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家们走出书房，走向人民大众，满怀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对抗战军民的赞颂、对和平光明的向往、对黑暗势力的痛恨，投身到火热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去。他们以笔做刀枪，热情地讴歌全民抗战运动，愤怒地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抗战文学，是进步的文学、战斗的文学、反抗的文学。它为中华民族八年抗战史留下了史诗般的画卷，中国新文学也由此进入“第三个十年”。经过前两个“十年”的酝酿与积淀，新文学摆脱了童年期的幼稚和少年期的迷惘，在最需要大风大浪历练的青年期经历了八年抗战硝烟的洗礼，终于将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崭新形象展现在文学史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永远铭记那段被血与火映红的岁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的“血肉筑起的长城——抗战中的文学”展览近日在北京举行。在开幕致辞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指出：抗战中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和文化长城上不可或缺的坚强堡垒，抗战的伟大胜利凝聚着全民族的牺牲和奋斗，也包含着中国作家们的激情和奉献。

本次展览从筹备到正式展出，历时8个月。展览内容以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书影为主，辅以40余件馆藏书、报、刊及手稿精品。主创人员打破此前同类展览常规，创造性地用10余首群众耳熟能详的抗日救亡歌曲为线索，贯串起文学界自“九一八”到“八一五”十几年间的抗争历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展览第一部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反映了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抗敌文学成绩。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伪满洲国”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大批青年学生和作家被迫流亡关内，形成了引人瞩目的“东北作家群”。“一二八上海事变”“华北事变”“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变故，也直接影响了全国各地民主爱国作家们的创作方向。他们饱含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激愤，满怀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对国家人民的殷切希望，用一部部作品揭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奏响了全民族解放斗争的序曲。

在这一部分展览中，“东北作家群”的代表性人物萧红、萧军、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李辉英和他们的代表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没有祖国的孩子》《科尔沁旗草原》等被浓墨重彩地推出；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东北抗联将士的诗作、“一二八事变”后文学界掀起的报告文学创作高潮，以及30年代中期“国防戏剧”“国防文学”的标志性作品《赛金花》等，也是这一部分展览的重要内容。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第二部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主要展示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的爱国作家们行动起来、积极投身抗战文艺运动的光荣历史。卢沟桥的枪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作家的爱国热情，他们当中有些人直接投笔从戎，更多的是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创作活动，自发结成各种抗战文艺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领导下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文学为抗战服务”为口号，通过发表宣言、创办抗敌文艺刊物、广泛开展街头诗、街头剧和竞写报告文学等形式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此期间成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并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大力倡导通俗文艺，组织编写了数十种通俗读物和《抗战小丛书》；每年召开纪念鲁迅的集会，为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寿辰或新作品聚会祝贺，以此来促成文艺界的团结；开展救济贫病作家、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等工作。“文协”始终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旗帜。“文协”会刊《抗战文艺》是唯一贯通抗战时期的文艺刊物，它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胡风主编的《七月》，以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一起，撑起了抗战文学的四面战旗。

阿垅、骆宾基创作的反映“淞沪抗战”的《第一击》《大上海的一日》《东战场别动队》，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和《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宋之的的一系列经典剧作，以及众多作家集体创作的话剧《保卫卢沟桥》和小说《给予者》《华北的烽火》，都歌颂了抗日军民的斗争精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面目。姚雪垠、臧克家、田涛等人或是奔赴前线采访，或是从事随军宣传工作；丘东平甚至在战场上壮烈捐躯，为后人留下《茅山下》五章残稿。丁玲、王礼锡、老舍等作家领导或参与了赴前线慰劳抗日军民的活动，将前线的真实情况带回大后方，鼓舞了后方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刘白羽的《游击中间》、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卞之琳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等，内容真实可信，记叙朴素无华，引起了大后方文艺界的深切注意。艾青发展了中国自由诗的战斗传统，以长诗《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火把》《吹号者》和诗集《北方》《黎明的通知》等成为这一时期自由诗创作的代表人物。沙汀、艾芜、张天翼、张恨水等的小说，则生动反映了大后方的人间百态。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第三部分标题“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出自光未然、冼星海的传世名作《黄河大合唱》。持续的战争状态和全民动员的抗战努力，造就了不同地域各异的文学样态。在大后方，长篇小说、话剧、杂文创作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家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物质条件上的重重困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绩，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终于在根据地结出了硕果。

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夏衍的话剧《法西斯细菌》《愁城记》，郭沫若、阳翰笙的《屈原》《虎符》《李秀成之死》等一系列历史剧，巴金的“抗战三部曲”《火》展示了大后方的创作实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鲁艺”的建立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产生了深远影响，孙犁、丁玲、周立波、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柯蓝、邵子南等都创作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佳作。远在西南边陲的一批诗人如冯至、穆旦等，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仍然坚持着现代主义的创作实践。一批国际友人也深入前线，用手中的笔向世界传达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苦与英勇。

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作家们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耕耘不辍；乐观斗争，矢志不移”，“誓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展示了对生命的重新体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作家和他们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

红军北上抗日的昂扬战歌

——毛泽东抗战诗词赏读（上）

易　行

说到毛泽东诗词中与抗日有关的诗词，首先要提《七律·长征》。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抢渡湘江又遭惨败，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放弃北上湘西往敌人重兵把守的圈子里钻的错误主张，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发。经过激烈争论，政治局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带领红军突破敌军的重重封锁进入贵州，后又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紧接着又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再后，于1935年9月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占领岷州；10月又占领通渭，获得了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初步胜利。

就是在这样“豁然开朗”的亢奋状态下，毛泽东写了《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时，红军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两万里，突破敌军的封锁和路途的艰难，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北上抗日，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举动既保存了自己，又赢得了民心。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最后胜利至关重要的一步。所以，《七律·长征》非同一般的作战行军诗，它是红军北上抗日的雄壮序曲，是红军能征服一切艰难险阻的豪迈宣言，所以，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抗战史诗价值。

接下来，再看《清平乐·六盘山》。近年来，一些抗日诗词选本未选这首词，究其原因，可能是看了毛泽东对该词作的自注，而误认为它不属于抗战诗词。

毛泽东在为《清平乐·六盘山》所作的自注说：词中“何时缚住苍龙”的“苍龙”，指的是“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指长征期间）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既然毛泽东自己都说了“苍龙”“是蒋不是日”，那么该词不属于抗日战争诗词似无疑义。其实不然！只要深究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全副精神”对付蒋是为了什么就都清楚了。红军对付蒋，还不是为了打破他企图剿灭共产党的图谋吗？而粉碎他的围剿图谋保存自己，也是为了“全副精神”抗日。红军所以长征，就是为了实现这一“克蒋”抗日的战略目的。

清楚了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也就清楚了《清平乐·六盘山》作为抗战史诗的本质。首先，它发出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抗战誓词，抒发了“屈指行程二万”的胜利喜悦。当年，长城已是抗战的烽火前线。“不到长城非好汉”与田汉当年所作“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异曲同工，同样是动员全民抗战的冲锋号角。另外，该词设问“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则是对抗战胜利的期盼与展望。本来，毛泽东原词写的是“他年缚取苍龙”，后改为“何时缚住苍龙？”因为“缚取苍龙”在当时既无力办到，也不符合毛泽东自己的战略思想。当时的战略思想是逼蒋、争取蒋放弃“剿共”方略，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所以毛泽东用“缚住”也就是捆住蒋疯狂“剿共”手脚的这样一个切合实际的词汇。这反映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与宏伟气魄。苏联尼·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所述：“毛泽东说：‘苍龙是泛指敌人’……无论说日本侵略者还是国民党反动派，都没错。’”在这里，毛泽东把“苍龙”解释为“泛指敌人”同样符合他的词意与当时的战争实际，因为缚住蒋也是为了缚住日。所以，无论哪种解释，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词都是歌咏红军长征、鼓舞全民抗日的昂扬战歌。（**待续**）

（作者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

中华诗词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

中华诗词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0日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对大会作出批示，提出了殷切希望。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写来了贺信和贺诗。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钱小芊出席并讲话。

当下，喜爱中华诗词的人越来越多，诗词创作队伍越来越大。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在致辞中希望与会代表共同努力，推陈出新、多出精品，攀登诗词创作的新高峰。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作了题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于弘扬诗词文化的历史担当》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213人的新一届理事会、71人的常务理事会和学会领导班子。郑欣淼继续当选为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李文朝继续连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代雨东、李树喜等当选为副会长。　（何　文）

第29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举行

由中华诗词学会举办的第29届中华诗词研讨会暨科尔沁区“中华诗词之乡”授牌仪式，日前在内蒙古通辽市举行。与会的诗人学者围绕诗词创作如何贯彻“三贴近”、诗词的改革创新、诗词与时代结合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通辽市科尔沁区“中华诗词之乡”授牌仪式同时举行。会上，还为全国第一家中华诗词馆举行了揭牌仪式。　（文　一）

老病孤舟社稷心

——杜甫《登岳阳楼记》赏析

周笃文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被誉为盛唐五律第一的诗，作于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的冬日。这年正月，杜甫告别了居住两年的夔州（奉节），经过江陵、公安，然后横渡洞庭，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岳阳楼。他凭栏远眺，面对着浩渺无际的天下名湖，不觉逸兴遄飞，写下了这首杰作。

诗的首联以“昔闻”“今上”一对而起，节奏迅快，流露出宿愿得偿的欢欣之情，并为下句蓄足气势。接着推出了“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样海涵山负的壮词伟句，高格独标，气象顿开。“吴楚”兼具地域和历史二义。洞庭湖不仅分隔吴楚，它还是吴楚两国争霸、刀兵血火的战场。一个“坼”字，便透出了兵争之乱象，是语带双关、力抵万钧之笔。这样用词还有影射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的意味。“乾坤”句则进一步发挥联想。《水经注》云：“湖水广五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这里将“日月”换为“乾坤”有一种夸张的效果，似乎天地乾坤都在湖中起伏。

杜甫的《江汉》诗有“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咏怀古迹》中有“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之语，皆以“天地”“乾坤”连用，以形容寥廓浩荡、无有际涯。蔡绦在《西清诗话》中说：“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题之者众矣……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知几云梦。”老杜之胸襟气象真可谓妙夺造化了。诗重章法，老杜尤甚。

当颔联已将诗境营造到如此雄浑壮丽的地步，如何接下去就成为一大难题。然而正如叶燮《原诗》所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变化而不失其正，惟杜甫为能。”“杜甫，诗之神者也，夫神，乃能变化。”诗人到此笔锋一顿，推出“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颈联。这是以小形大、以苦衬乐的对比手法，营造出两联巨大的落差：将诗人老病缠身、音信断绝，一家老小托命孤舟漂泊无依的悲苦状态写到极致，令人为之凄然。

中二联由阔大的自然转入孤寂的身世，转变极大，尾联如何着笔呢？杜甫毕竟是非同凡响圣手，笔锋一转便推出收结之笔“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戎马关山”四字破空而下，别开奇境，上应“吴楚”“乾坤”之壮阔，下开涕泗横流之哀时，可谓天设地造之绝唱，顿时将个人的老病哀伤之感提升到国运民生的关怀上来，极大地突显诗人胸襟之高远、博爱之无垠了。

大家知道，杜甫是位奉行儒家仁政的爱国诗人，他的政治主张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使》）以及“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奉先咏怀》）的王道理想。正如叶燮《原诗》所说：“杜甫之诗，随举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见其忧国忧民，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说得太好了，可谓此诗的确解。李东阳以“吴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庙故人情”赞美此诗，钱大昕则以“已极登临目，真开浩荡心”评价之。

正是这种孤舟老病而不忘社稷民生的大爱深情与宏规远略，赋予此诗以无与伦比的审美价值与道德力量。这样的千古绝唱，必将光景长新，与大地山河同其永久。

诗词赏鉴